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湄潭茶叶科技的发展

陈保健黄观新代修平

- (1. 遵义师范学院, 贵州遵义 563002;
2. 湄潭求是高级中学;
3. 湄潭县黄家坝中学, 贵州遵义 564100)

摘 要:抗战期间我国东部沦陷,当时国民政府选择在贵州湄潭发展茶叶生产的主要原因是茶叶受到国际青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们需要换回抗战急需的军火和药品,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浙大师生与中央实验茶场的同仁在湄潭合作,发展茶叶科技,兴办茶业教育,使湄潭茶叶的栽培和加工技术得到较大的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湄潭;茶叶科技发展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正式开始,我国国土大片沦陷,当时我国对茶叶的生产和贸易相关政策,也作了相应的修改。因此,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难,在这个阶段我国的茶叶生产、科研和教育,仍然获得了一定的提高与发展,而在这个时期贵州湄潭的茶叶科技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主要原因还是茶叶科技工作者发奋努力的结果。浙大西迁最后到达的目的地——贵州湄潭是经济、科技和教育都相对落后地区,浙大师生在倡导“求是”精神的同时,十分注重将自己的科学研究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以农学院为主,产生了一批具有重大社会经济效益的科研成果。

1 抗战期间我国发展茶叶经济的动因

1.1 发展茶叶生产贸易是为了换回抗战急需的药品、武器

抗战爆发以后,我国东南沿海被日军占领封锁,国民政府想在西南山区创建茶叶科学研究和生产出口基地,进行茶叶生产,试图通过西南重要通道——史迪威公路和驼峰航线进行出口,换回更好更多的武器和药品用来抗击日本侵略军。为了扩充茶叶种植面积,改进茶叶生产技术,增加茶叶产量,国民政府经济部任命中国茶叶公司负责此事,并制定西南4省为发展战时茶叶经济的主要茶区。

1.2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关于发展茶叶生产的计划

为动员民众发展生产,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了全国生产会议,时任福建省福安茶业改良场场长的张天福作为全国茶界唯一代表参加会议,并提出发展西南五省茶叶的建议。1939年4月,经国民政府农业促进委员会主任穆藕初推荐和要求,张天福参加了由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联合派遣的茶叶考察专家组,前往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等老茶区实地考察。张天福等最终看中贵州湄潭。专家组返回重庆后,向中央农业实验所汇报了考察结果,得到所长谢家声、副所长沈宗瀚支持。

1939年5月,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全国生产会议,张天福宣读了由他执笔撰写的《发展西南五省茶叶》考察报告。大会还将报告作为会议提案,受到蒋介石、孔祥熙、翁文瀚等高层的重视,决定在湄潭创建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实验茶场。

2 两支科学教育队伍在贵州湄潭历史性汇合

2.1 浙大师生与中央实验茶场在湄潭的合作

抗战期间,浙大西迁,历经江南六省,辗转跋涉两千六百多公里,最后迁至贵州的湄潭和永兴,在这里开始艰苦办学。

1939 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经济部派出的 40 余位国内知名专家来到贵州湄潭,筹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科研生产机构——中央实验茶场。

中央实验茶场落户湄潭,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湄潭,场校合作,两支科学教育队伍在湄潭历史性汇合,相得益彰,他们为当地农民提供茶树栽培、育种、制茶、防病等研究,对后来的湄潭茶业影响极大。

2.2 浙江大学与中央实验茶场创办贵州省立实用职业学校,共同培养茶业人才

由于贵州对茶业的发展,对茶叶人才的需要越来越大,因此,“这一时期湄潭在茶叶专业教育上,也出现了不少创新”。1941 年秋,由中央实验茶场场长刘淦芝博士和教育家江问渔,浙大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博士等倡议,由中央实验场和浙江大学联合创办了“贵州省立实用职业学校”,设有茶叶科和蚕桑科,学制三年,茶叶科主任由中央实验茶场技术室主任李联标兼任,浙大部分教授兼任教师,该校共办两期,培养了茶叶专业技术人才 100 余名,[1]为贵州茶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 抗战期间湄潭茶叶的栽培和加工技术的传播与发展

中央实验茶场在湄潭除了开垦象山示范茶园,还收购桐子坡土地 50 余亩,征集全国 13 个省 235 个县的茶树品种 197 份,育苗定植 133 份,辟为全国茶树品种园。从 1940 年到 1949 年,实验茶场在抗战最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茶叶科学研究,在 10 年时间里结出累累硕果,在当时和以后产生的重大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茶叶育种方面的研究

中国著名茶叶专家李联标 1935 年金陵大学农艺系毕业。先后参与筹建 4 个茶叶科学研究机构,其中之一就是参与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湄潭茶叶科学研究所筹建。由李联标主持的茶树品种资源的征集与比较研究,他对湄潭、凤岗等地茶树品种资源进行调查研究,将地方茶树品种分为十大类型:野生乔木大叶大茶树、半乔木大叶大丛茶、灌木大叶茶、团叶茶、鸡嘴茶等,并著有《茶树育种问题之研究》一书。1941 年他和叶知永徒步考察了古代黔中茶区的湄潭、凤岗、德江和务川 4 县的茶树品种资源。在务川老鹰山岩上首次发现一棵 7m、叶长 13.6cm,叶宽 7-8cm 的中国野生乔木型大茶树,提出了中国是世界茶叶起源地的结论。其主持茶树育种与栽培试验达 23 项,其赴美留学前,写成《茶树育种问题之研究》此乃中国近代最早提出茶树品种征集鉴定也是茶树分类的研究理论文献之一[2],为以后贵州茶树良种选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茶叶病虫害调查研究

中央实验茶场建场之初,刘淦芝为中央实验茶场首任场长,兼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他亲自主持对湄潭茶树病虫害进行调查及主要害虫生活史研究,共收得“紫霞茶蚜、茶摆头、背袋虫、负球军配虫、紫衣茶金花、三星茶象、红颈茶牛”等茶树有害昆虫标本 64 种,并在

《农报》1941 年第七卷第 16-21 期上写成中国最早的茶树害虫调研报告之一《湄潭茶树害虫初步调查》。上任当年就率领员工在湄潭县城南门外象山垦荒植茶,开创了中国现代茶叶科学研究和现代茶业的先河。

《茶情》(1941年4月26日)第十二期载:“为明了湄潭茶树之病害,特请浙大陈鸿逵、杨新美两位先生于4月15至25日,来场调查茶树之病害,受病率达10.17%”。经他们对本乡间茶芽叶48112个加以检查,发现其受病率达10.17%。这是湄潭最早也是贵州最早的茶树病虫害记载。浙大学士毕业生曹景熹根据茶树虫害研究实践,于1942年编写成《世界茶树病虫害一览》专题报告,列出世界茶树虫害为2纲11目52科219种。浙大植物病虫害系教授陈鸿逵及葛起新讲师应茶场之约,曾到茶场对茶青受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写成论文《湄潭茶树病虫害之研究》。

3.3 试制生产的工夫红花—“湄红”、炒青绿茶—“湄绿”茶

中央实验茶场在湄潭茶农传统加工工艺基础上,学习外地的工艺,成功地创制出多种名茶。中央实验茶场《茶情》(1941年)载:湄潭乡镇茶区已经生产少量毛尖茶、饼茶和大宗茶。中央实验茶场则产有外销工夫红茶—“湄红”、炒青绿茶—“湄绿”、仿制龙井茶、桂花茶、玉露茶等。

3.4 湄潭茶叶科学研究所与浙江大学合作开展茶叶和土壤分析

茶叶的生化成分测定:湄潭茶场建场初期,因技术设备技术欠缺,无法从事茶叶的生化和分析测定工作,因此就借助浙江大学的人才和设备,特请浙大农化系师生承担此项工作。浙大师生帮助其测定分析出主要成分单宁(茶多酚)的含量,并在该场1941年编印的《茶情》第十二期予以揭示,这在贵州也属首次。同时,浙大农化系白汉讲师还写出论文,《采摘期与采摘方式对茶叶单宁量之影响》。浙江大学农学院为中央实验茶场分析检测新茶的成分。杨守珍、陈鸿逵等帮助分析调查茶园土壤矿质元素分析。根据浙大《湄潭茶产调查报告》记述,浙大农化系彭谦教授、陈善明助教等取本县63份茶土样本进行分析,最终得出茶土中铁和钙的精确含量,并同时测定茶园土壤的酸碱值,以此写成论文《湄潭茶树土壤之调查》和《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

3.5 徐国桢的茯砖茶“金花菌”与其茯砖茶发酵关系研究

徐国桢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在中央实验场工作8年(1940-1947年),任持士负责制茶和茶树育种研究工作。他在湄潭悉心研究“金花菌”,为中国“金花菌”研究创始人,研究成果有《茯砖茶黄霉菌的研究》。因长有“金花菌”多少是茯砖茶品质优劣的重要标志,他称“金花菌”即黄霉菌。时隔50年后,贵州农学院院长刘作易博士在研究真菌的论文中称:“在他(徐国桢)之前未见任何茯砖茶‘金花菌’的研究文献报道”。

3.6 湄潭茶叶的工业化生产

1940年实验茶场成立之初,分别从云南顺宁、浙江杭州聘请制茶师傅,试制外销工夫红茶“湄红”和扁平类名优绿茶“湄绿”。同时,大量收购湄潭老茶区大庙场等地茶青,进行大规模生产加工。茶青萎凋采用多层竹制萎凋帘,揉捻从手工制作转为木制机具加工,砖茶从手筑转为木质机压等,开贵州茶叶生产工业化之先河。

抗战期间在茶叶科技工作者和浙江大学师生的努力下,贵州湄潭茶叶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带动了当地茶叶的生产和加工业发展,对当时和以后的茶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积极支持了抗战事业,为反法西斯的斗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周开迅.《永远的大学精神》[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3 出版,第 153 页.

中共湄潭县委宣传部湄潭县对外宣传中心《一个县一片绿叶》[J],贵州日报.2013.05.06.